

人类学与科学史研究立场的异同

——关于“主位”-“客位”与“辉格”-“反辉格”的比较研究

刘 兵 包红梅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

摘要：“主位”与“客位”概念是人类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辉格”与“反辉格”则是研究科技史的两种不同的倾向。这两对范畴，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很多相异之处，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二者也存在着许多共性。对两对概念的比较研究能使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更深入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这也是有意义的科学编史学研究。

关键词：主位 客位 辉格式 反辉格式

1. 引言

目前，学科间的交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因而产生了众多引人注目的并富于启发性的新成果。然而，在我们注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交叉时，也注意到不同学科之间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与方法在最基础性的意义上的异同，也会让我们对于学术研究的某些“共性”与“差异”有更好的理解。近些年来，在人类学与科学史方面的交叉日益增多，尤其是站在科学史的立场上看，科学史这个学科可以从人类学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中获益良多。当然，人类学与科学史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其间无论在对象、理论、方法、趣味上都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其间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还是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甚至是近乎于平行的发展。本文，即立足于此，将人类学中的“主位”与“客位”这一核心的概念，与科学史中的“辉格式”解释与“非辉格式”解释，作一比较性的科学编史学研究。

2. 一组对立的概念与两种对立的立场

2. 1. 在人类学中主、客位概念

“主位”与“客位”概念是人类学研究中较为重要和基础性的一对范畴，尤其在如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随后的民族志写作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果

要仔细地追溯人类学中主客位概念的引入，前后有着比较复杂的过程。简单地说，“主位”（emic）与“客位”（etic）一词最初是由语言学家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所使用的。他指出这两个词分别是利用“音位学”（phonemic）和“音素学”（phonetic）的后缀创造出来的。^{[1] (P. 42)}“语音学（即音素学）根据发音研究某种语言的声音，这些语言的发音因通过人体各部分发挥的不同作用和声波对环境产生的独特影响而被分门别类。”“音位学研究的声音属于某种隐含而无意识的语音对比系统，本地语者藉着内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对比系统，识别其语言中有意义的发音。”^[2]也就是说，不懂本地语的人（外部视角）看语言看到的是其结构即其物理属性，而以其母语者（内部视角）看到的是语言本身的意义即其社会属性。派克认为这种语言学上的分析方法对于文化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主位研究，类似语言学中的音位分析方法，从文化内部看文化，更容易理解特定文化所包含的特殊意义；文化的客位研究，类似语言学中的音素分析方法，从文化外部看文化，更多是和自身文化的相比较当中去理解文化差异。

其实早在派克创造“主位”“客位”两个词之前，类似的研究方法已经被人类学家所运用，只是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论述和讨论。比如，以博厄斯（Franz Boas）为首的历史学派在田野调查当中，就已经非常强调当地人的想法（即后来被称为的主位方法）。博厄斯指出，“如果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就是我们严肃的目的，那么对经验的全部分析就必须建立在他们的概念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概念基础上。”^[3]

此外，也有一些人类学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实践着这两种不同的研究立场。而“有关民族志主位方法的一些更重要的纲领性阐述是由弗雷克、格拉德温、斯特蒂文特和古迪纳夫1957提出的。”^[4]例如，其中古迪纳夫就通过关注文化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学习文化的工具。通过学习和使用其语言去了解和获得另一个社会的文化——对文化的分析可以通过对具有文化意义的语言的分析、语义学分析来获得。通过对言语行为的观察可发现文化的形式。不过，像这样的分析虽然与前面所说的派克的“主位”、“客位”的更立足于语言学的概念有所相关，却已经更以人类学家的立场在与文化相关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当然，这与后来更为明确的人类学中的“主位”、“客位”的方法概念相比，应该还算是中间过渡的发展形式。

在诸多前人基于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讨论的基础上，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对主客位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最初是在1964年的《文化事务的本性》一书中引用派克的主位客位两个术语^{[5] (pp. 133-150)}，主要还是讨论有关语言行为方面的内容，后来在其《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人类学概论》两本书中则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主位客位研究方法。哈里斯认为，想要全面的说明一种文化，可以从事件参与者和旁观者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一文化中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前一种方法叫主位法，后一种叫客位法。这两种方法对于田野调查来说都是必要的。哈里斯指出：“在进行主位文化研究时，人类学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以便能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客位研究方法常把当地提供情况的人认为是不恰当或无意义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6] (P. 17)}

2.2. 在科学史中“辉格”与“反辉格”概念

本文作者之一，曾专门讨论过科学史中的辉格解释问题。^[7]为了讨论的方便，这里对有关情况再简述一下。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过两个对立的政党：即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早在19世纪初期，辉格党阵营中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和支持辉格党的政见。同样，托利党的历史学家也有着鲜明的党派立场。这正如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 B. Macaulay）所明确地指出的，在很长的时间中，“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专制的。”^{[8] (P.6)}

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 Butterfield）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在这部史学名著中，巴特菲尔德将“辉格式的历史”（或称“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概念作了重要的扩充。巴特菲尔德明确地指出，这本书“所讨论的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写作，赞扬使他们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9] (P.V)}

据此，巴特菲尔德提出了一个广义的辉格式（Whig）历史的概念，它涉及到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倾向，是一种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陷入其中而又未经检查的心智习惯。也就是说，这是指历史学家们采用今日的立场、观点来编织其撰写的历史，认为只有这样，历史上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巴特菲尔德认为这样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历史学家不应强调和夸大过去与今日之间的相似性，相反，他的主要目标应是去发现和阐明在过去与今日之间的不相似性，认为历史学家们的立场应该是：“不是要让过去从属于今日，而是……试图用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假定路德、加尔文和他们那代人只不过是相对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才是绝对的，这样做是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理解的；要获得这种理解只能是通过充分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那代人与我们这代人同样正确，他们争论的问题像我们争论的问题一样重要，他们的时代对于他们就像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一样完美和充满活力。”^{[10] (pp. 16-17)}巴特菲尔德对于辉格式历史研究立场的批评，后来在科学史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前，科学史界几乎一直是在以这种“辉格式”的立场来撰写科学史，例如，站在今天科学的立场上，将历史上的“科学”和“伪科学”截然分开，写出科学一路走向今天的胜利的光辉历史。大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专业的科学史学家当中，极端的辉格式研究倾向开始逐渐为“反辉格式”的研究所取代。尤其是，随着美国科学史家职业化，新一代科学史家的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对“辉格式”历史的拒斥。^{[11] (P.44)}也正是在这样的立场和倾向中，才会出现后来对于像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研究，以及其他更多对于在以往的科学史中被忽视了的内容的研究，从而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史的另一张面貌。

3. 两组概念在两个学科中的意义与争议

3.1 关于人类学中主、客位研究立场

在人类学中，虽然对于究竟采用主位还是客位的立场等问题还有争论，但至少主位和客位已经成为人类学领域中研究方法或立场方面的基本概念了。

对于主客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人类学家也有不同的偏好。在人类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学家们更多的是运用我们现在认为的客位意义的研究方法，即将自己完全当作局外人看待土著人及其日常生活，按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去评价土著人的文化行为，其结果是形成了进化论和传播论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理论。但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始，情况有了转变。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领悟到想要真正了解土著人的想法，必须要贴近他们的生活，尽可能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从而开创了这种“移情”式的研究方法。之后很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道路，在田野调查中非常注重当地人的想法。“尤其从60年代开始，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话语和研究兴趣已经转移到理解本土人的思想观点、理解他们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他们自己世界的看法上来。”^{[12] (p. 47)}又如，历史学派的博厄斯等人和解释学派的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都比较强调主位研究方法。

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两种方法哪个更优，实际上，它们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和取向，各有各的优缺点。主位视角由于是“从内部看文化”能够从当地人的立场去思考当地人的问题，从而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被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情感表达和行为活动背后的意义。对于理解特殊群体独特的文化体验和解释一个特殊群体文化的细微差异有更大的作用。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活体验产生的情感共鸣，能够更深刻的体悟“局外人”所无法理解的文化细节，获得更多的在“局外人”看来无意义的，而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但是主位研究方法也有它自己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如何能真正做到从当地人的立场和视角看问题，这是个难题。如果研究者就是当地人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点，毕竟他对当地的语言到文化都很熟悉，能更好的理解当地人的想法。但与此同时，由于太了解反而对很多重要问题会熟视无睹，失去研究者需有的敏感性，从而可能会影响其研究结果。而如果研究者是个对当地毫无了解的外地人，且对其语言也不熟悉，这虽然能使他保持对各种现象的敏感性，但同时却降低其从“内部视角看文化”的质量。因为，语言的障碍会使研究者缺失很多有用的信息，即使学会了当地语言，但语言所负载的各种文化内容却不是一年半载能够领悟到的。此外，毕竟一种经过千百年的积淀而形成的特殊文化形式，并不是研究者一朝一夕就能习得的。这也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人类学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也许能够发现这个社会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权利形式的一系列关系，即其“客观结构”，而很难“习得”积淀在个人身上的由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的“身体化”结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者并不能感知一个当地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相同感知。他所感知的是一种游离的，一种‘近似的’或‘以……为前提的’、‘以……而言的’，抑或诸如此类通过这种修饰语言所暗示的那种情景。”^{[13] (p. 75)}

客位研究方法，从外部视角看他者的文化，也有其自身的优点。就如我们通常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类学家作为旁观者看异文化时，更容易看到这一文化相对于其他文化的独特特征，能够发现很多被他们自己习以为常的，自己发现

不了的问题和意义。“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整体结构,更容易看到整体和其他相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也更易于发现和预测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和趋向。”^[14]但同时客位分析方法也有很多缺点,比如单一的客位描述往往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用研究者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等去衡量另一种文化,很容易排斥和贬低对方或者强加给它原本不存在的意义,做出不合理的解释等。

事实上,在实际的研究中,主位视角和客位视角并不是截然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相互渗透的一对范畴,很多情况下二者也很难进行绝对的区分。比如在人类学的结构调查中,“因为任何结构调查都必须依赖于人的言语反应(而不是直接观察),按照哈里斯的定义,可能认为这是主位方法的。但是结构调查经常由田野工作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者的理论观点来设计,并按照人类学的(而不是“土著”的)范畴来解释。”^[4]

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的主位研究或绝对的客位研究,人类学家所要做的是对二者取长补短,将二者结合起来,寻找一个平衡点。就如吉尔兹所说,“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的像是真正的巫师写得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得那样。”^{[13] (P.75)}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还要看研究者本人的能力和悟性了。

3.2 关于科学史中“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立场

前面提到,在科学史领域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对于“辉格式”科学史的拒斥,职业科学史家们热情地追求和拥抱“反辉格式”的立场。然而,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科学史家们当中对此问题又出现了新的反思,让人们认识到了那些职业科学史家们所追求的极端的反辉格式历史的不可能性。

颇有反讽意味的是,人们首先注意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即最先提出“辉格式”历史来作为历史学一般性概念,并对这种立场持批评和反对态度的巴特菲尔德本人,后来也曾涉及科学史的实际撰写,在1949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科学史著作——《近代科学的起源》,但他的这本科学史著作的写法,却正是他所强烈批评的那种辉格式的写法!在书中,他并未试图在一个时代的总体构成中(即社会的、智力的乃至政治的构成中)去理解那个时代的科学,甚至于预先便知道近代科学的起源在何处,这样,他描述的只是能够表明在17世纪的科学中带来了近代对物理世界的看法的那些成分,更不用说他也根本就没有提到像帕拉塞尔苏斯、海尔梅斯主义和牛顿的炼金术等内容。

1968年,还是在科学史家们热情追随“反辉格式”科学史的时候,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科学的历史”中,曾提出了科学史家们持“反辉格式”立场的理想做法,即“在可能的范围内……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15]^(P.108)但问题是,科学史家真的能够彻底忘记他所知道的当代科学,让自己的头脑变成“真空”再回到过去吗?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在科学史家当中，毕竟还有一些人持有不同程度的“科学主义”立场，认为科学这个科学史研究的特殊对象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带有了某种客观性，可带着人们走向“真理”。当然，这种坚信科学的“进步”的信念，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等新兴的科学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所解构，但无法否认的是，今天人们即使进行“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研究，仍无法彻底摆脱今天的科学背景知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纵观上个世纪 70-80 年代科学史家对此问题的反思，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极端反辉格式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也是有问题的，但他们通常也不赞成极端辉格式的倾向，而是赞同两者的有机结合。克拉（H. Kragh）在其 1987 年出版的《科学编史学导论》中的观点似乎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指南和对辉格式历史的解毒剂，反辉格式的编史学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历史学家无法将他们从自己的时代中解放出来，无法完全避免当代的标准。在对一特殊时期进行研究的初期，人们无法按那个时代自身的标准作评价和选择，因为这些标准构成了还未被研究的时代的一部分，它们只能逐渐得以揭示。为了要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任何观点，人们就不得不戴上眼镜，不可避免地，这副眼镜必然是当代的眼镜。克拉的结论是：在实践中，历史学家并不面临在反辉格式的和辉格式的观点之间的选择。通常两种思考方式都应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研究的特定课题。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象罗马神话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Janus）一般的头脑，能够同时考虑彼此冲突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的观点。^{[16] (PP.104-107)}

4. 简要的比较与分析

在前面，我们分别讨论了人类学领域中的“主位”与“客位”的研究立场，以及科学史中的“辉格式”和“反辉格式”立场。如果将这两件事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共同之处，一些差异，也可以尝试得出一些有启发性的结论。

先说差异，由于传统中人类学与科学史研究的对象不同，差异是明显的，首先是在研究的共时性和历史性方面的差异。但其实这种差异在我们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中并不十分重要，而且，后来像历史人类学的出现，以及科学史中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这种差异。

由于学科的不同，还有另一个差异存在，即这在两个学科中这两组对立的概念出现的根源的不同。主位和客位的对立，主要是源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同。解释人类学的代表者吉尔茨曾这样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类学家）首先坚持认为，我们是透过自己打磨的透镜去观察其他人的生活，而他们则是通过他们自己打磨的透镜回过头来看我们。”^{[17] (P25)}而科学史中的“辉格式”与“反辉格式”立场的对立，表面上似乎是源于是否采用当代的标准的问题，实则是源于历史研究必须对那种原则上无限丰富的“历史”进行节略，辉格式的历史只不过是给出了一种简便但又过于简便的节略标准，而反辉格式的历史，则体现出了一种试图对抗节略但又无法彻底实现的理想。

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共同性还是明显的。在这两个领域中，这两组对立的概念和相对应的立场，分别对应着在两个领域中在研究方法、视角和立场上两种极端的理想化。而在现实的研究中，这种理想化却是无法真正彻底实现的，于是，人们只能根据不同的与境进行自己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其实恰恰带来了在各自研究领域中研究结果的多样性。

再向深处，也许这种讨论还可以引申出一种哲学上的思考。即传统中所谓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对立。从形式上看，主位，或者反辉格式的科学史，似乎代表着对于某种“客观”的追求，而客位，或者辉格式的科学史，则因承载了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而带有某种主观性，但在现实的研究中，实际上两种极端的客观与主观又都是无法实现的。也许，正是在这两种理想的主观与客观之间不同的妥协和有差异的选择，才带来了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的写作。

参考文献

[1] Pike, K. L.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M]. Part I, [Preliminary Edition.]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54.

[2] 马文·哈里斯著. 马光亭译. 主位与客位辨异的评说与意义[J]. 民间文化论坛. 2006(4): 80—90

[3] Boas, F. Recent anthropology[J]. Science. 1943(98):311—314.

[4] 帕梯·J·皮尔托, 格丽特尔·H·皮尔托. 胡燕子译. 人类学中的主位和客位研究法[J]. 民族译丛. 1991(4): 20—28

[5] Harris, M. The Nature of Cultural Things[M]. Random House, 1964 .

[6] 马文·哈里斯, 文化人类学[M]. 东方出版社, 1988.

[7] 刘兵. 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J].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1(1):44-52

[8] 转引自: Fisher, H. A. L. The Whig Historians [M]. Humphrey Milford Amen House. 1928.

[9] Butterfield, H.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M]. G. Bell and Sons; AMS Press reprint, 1978.

[10] Butterfield, H.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M]. G. Bell and Sons; AMS Press reprint, 1978.

[11] 刘兵. 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增订版),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M], 1999.

[12] 乔治·E·马尔库斯、米卡尔·M·J·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13] 克利福德·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14] 岳天明. 浅谈民族学中的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41—46

[15] 库恩. 必要的张力[M]. 纪树立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16] Kragh, 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 转引自: 莱德曼等编. 涂泓等译. 星光璀璨[M].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9.

作者简介:

刘兵, 1958 年生, 辽宁海城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与传播, email: liubing@tsinghua.edu.cn

包红梅, 1978 年生, 内蒙通辽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生, 内蒙古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科学文化与传播, email: bhm08@mails.tsinghua.edu.cn

Standpoint of Emic and Etic in Anthropology, Whig and Anti-whig in History of Sci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for the Two Couples of Concepts in the Two Disciplines

LIU Bing BAO Hongmei

(STS Institu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emic and etic is a very important couple of category i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Whig and anti-Whig are two different standpoints in the studies of history of science. Those two couples of category, which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disciplines, have many differences, however, in the deeper level, they have some commonness too. The comparative study for those two couples of concepts could bring us some revelatory understanding for each. This is also a meaningful study in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emic; etic; Whig; anti-Whig